

龚永辉 著



民族意识调控说

广西民族出版社

## 马 序

民族意识作为与民族社会存在相对应的精神系统，一旦形成即有巨大的稳定性。它不因阶级的消亡而消失，不因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消失。自从民族形成以来，直至阶级、国家消亡以后，只要民族还存在，民族意识就必然存在。民族问题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之所以可以伴随民族社会的始终，是因为这一部分与始终伴随民族过程的民族意识密切相关。因此，民族和民族问题整个理论体系中，应把民族意识当成一个基本概念。但是，几十年来，我们的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体系里面基本上没有形成这样的概念。80年代以后，民族理论界开始关注民族意识的研究。90年代以来，更形成了一个民族意识研究的热潮。

80年代步入学坛的壮族青年学者龚永辉同志，利用亲身经历8年之久的傣人识别实践经验，对我国民族识别实践的理论内涵进行了第二个8年的探索。在相继发表了十一篇系列论文、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广泛对话的基础上，撰成《民族意识调控说》一书。此书在众多的民族意识研究成果中显示了独具一格的价值与特色。

作为“民族识别的理论阐释”课题的终极成果,《民族意识调控说》除引论、结语两章外,主要内容都是对我国民族识别实践过程的回顾与分析。全书对民族意识及其调控的一切论述,都立足于对这些实践经验的描写与总结的基础上。这就与一般从概念到概念的民族意识讨论拉开了距离。

一般研究民族意识,往往从“民族共同心理特征”的假设前提出发,把它定义为民族自我意识。永辉同志则立足于民族社会中的互动实际,将民族意识分成我族观、他族观和民族观三个反映面,并在各个反映面中再划分知识性、意向性、决策性三类基本观念。他强调这三个反映面和三类基本观念构成一个动态系统。在民族社会背景中,这个动态系统内部诸因素不断相互作用和影响,最终形成一种合力反作用于民族社会,实现对民族社会的调节与控制。永辉同志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以自己在傣人识别实践中获得的具体感悟为契机,对民族意识调控现象进行了从个别到一般的探讨。

书中对傣人识别进行了专章描写,依照工作环节和要素的逻辑关系,分节介绍了傣人识别过程中:前赴后继、不畏艰辛的田野调查;格物求是,分科进取的专题研究;层面沟通,情理交融的社会协商;郑重庄严,步步落实的行政确认。让读者对这个微乎其微的事例,取得详实具体的印象。在此基础上,再设专章就这一详实具体的事例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引导读者一步一步地认识到,傣人识别是“傣傣意识”的互动过程;傣人识别中的学术探讨,是傣傣意识运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傣人识别的工程实质,是政府施行的傣意识调

控；从而对这项民族意识调控的工程作了历史评价，指出俾人识别工作具体落实了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调控的本质是良性的。

在对俾人识别的描写和剖析的基础上，专章扩展到民族识别实践各种类型中比较。如：“着重追溯历史渊源”，“民族支系的认定和归并”，“民族名称的确定与更改”等等类型。通过对不同类型例子的比较，不仅从不同侧面具体反映出民族意识调控的性质，而且在系统比较、全面验证微型经验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对民族识别整体工程形成了更切实际的评释。

我国的民族识别是一项伟大的实践，这项实践的一大特色是把民族概念置于具体民族社会实际中进行具体操作。因此，实践的过程对民族概念的具体定义必然会形成检验，从而使之更接近实际。50年代，我们在参加这项实践的过程中，已深深感觉到近代民族定义跟我国民族社会实际有很大的差异。曾经根据实践中的体会，把这种差异提出来在《光明日报》上公开讨论。我们认为，民族识别不仅仅是一项纯粹的学术活动。少数民族的族别问题既是历史遗留的，也是现实提出来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消除旧中国造成的民族歧视与压迫，建设平等团结的新型民族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讲，民族识别的政治意义并不小于学术意义。所以，我们在当时的讨论中还特别强调，在进行族别研究时，有必要更开阔地关切到各族当前发展的趋向<sup>1</sup>。

<sup>1</sup> 《光明日报》1957年2月15日第3版。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当时的这种讨论尚未能够深入持久地进行。后来的一些同志总结或阐释民族识别的经验，大多还是以近代民族概念的“四大特征”为理论框架。有的虽然也把民族识别视为一项政治任务，但由于对民族概念的理解还比较机械，使人从中误以为民族识别的政治与学术好象是“两张皮”：强调学术性就会否认政治性，强调政治性就会否定学术性。

永辉同志对民族识别的阐释，无论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还是在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上，都是辩证统一的。他认为民族在本质上是社会的一种分群形式。任何社会文化因素都可能成为民族之间的区别特征，但任何社会文化因素都不能固定地充当“民族特征”。社会文化因素要成为民族的区别特征，必须经历一个转换生成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人们的认同与辩异的矛盾作用实现的。因此，他把民族视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认同体。

同时，永辉同志认为，民族认同并非纯粹的精神现象，它以客观存在的社会文化或人际关系为基础，并在社会互动中具体实现。因此，他认为民族范畴的基本矛盾是民族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的具体形式，就是民族意识内部及其与民族社会存在之间的相互调节与控制。他把这种调节与控制概称为民族意识调控。他认为民族意识调控是民族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规律，认为任何民族现象、民族问题和民族实践都与民族意识调控规律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正因为如此，永辉同志才从民族意识调控的角度对民族

识别进行了重新阐释和评价。他在书中指出，族别问题与人们的认同辩异和政治互动直接相关。从民族识别各个环节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实践上看，这项工作都是由政府主持的，由民族学以及相关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并在各民族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实现的——对族际社会民族意识的具体调控。从整个调控的自身过程和前因后果来看，民族识别所实现的民族意识调控，是在千古巨变中趋向平等团结的良性调控。这种阐释与评价，比起那些政治与学术对立的、实践与理论脱节的种种评析，当然要切实一些。更值得重视的是，全书对民族识别的重新阐释，并不是就事论事。作者着眼于总结我国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努力联系古今中外民族社会实际，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构架进行反思，提出以民族意识调控为主题的科学假说，试图使人们从自在的民族意识调控规律中获得调控行为的自觉。

我与永辉同志是忘年之交，从他念大学调查研究侬人族属问题时起，我们就开始交往。我看过他写的侬人调查报告，针对报告内容交换过意见。根据他的课题实际需要和他的具体专业基础，我曾介绍孟高棉语言学专家王敬骝教授对他进行辅导。80年代末期，他到云南进修，师从尤中、王敬骝等教授。我们亦时相过从。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对民族历史、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探索民族意识的历史变迁问题。最初的成果是发表在《壮族论稿》里的两篇文章，着重分析了壮族历史上形成的“汉裔”观念。接着，又在《族际识侬》一书中提出了“侬意识”与“侬存在”的关系，并以这种关系作为全书结构的主轴，对侬人族属问题作了令人满

意的解释。1989年我到广西出席壮侗语诸族学术讨论会，作了《民族意识与改革开放》的报告，是永辉同志作的笔录。1997年11月，我到广西参加南昆铁路的建成与西南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学术讨论会，永辉闻讯来访。会谈中，他拿出《民族意识调控说》样书，征求意见，并谈起他在傣人识别完成后的持续研究和探索心得。我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搞民族理论必须坚持实践，做民族工作一定要抓住民族的心。现在，大半年过去了，这部专著才最后定稿，并作为“民族识别的理论阐释”课题终极成果，通过了同行评审。作为评审者之一，我很欣赏他从几代人实践经验中去建构假说的理论勇气，更欣赏他在探索中表现出来那种契而不舍的求是精神。我认为，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政治学的同行，尤其是搞民族理论的同志，阅读这本书都会有所启发；我相信，这部以假说名义出版的专著，将会与它的读者一道在争鸣与探索中走向真知；我希望，我们社会的民族意识良性调控，早日从自在走向自觉；我祝愿，永辉同志和其他青年一代的同行们，“齐跨虎步奔新纪，共举龙头振学纲”！

是为序。

马曜 1998年8月2日

## 周 序

一年前，我的朋友龚永辉老师，从广西寄来了他的学术专著《族际识侬》，这本专门讨论广西侬人族群从“要求”识别，到“被”识别，再到其“认同”最后有所归属，以及识别的“学术环节”（调查与研究）、“政治过程”（协商与确认）与族际关系环境等问题的书，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民族识别”，经过本世纪 50—60 年代的学术与工作实践及后来的总结归纳，现在已算得上是中国民族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特色，也可以说已经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的组成部分了。我以为，龚老师的研究又为这个传统和这个理论增添了新的内涵。他在这本著作中生动、清晰地描述了要求识别的“族群”（或其代言人）、“政府”及“学者”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这正是以前讨论“民族识别”问题时较为忽略的。我以为，我国过去的民族识别，确实曾经是一个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方方面面的因素都发挥了作用，但最重要的恐怕正是上述几个方面，即“政府”、“学者”和“民族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感到龚老师的研究，乃是对“民族识别”之本质的一种探讨。

1997 年 1 月，我们邀请龚老师来北京参加国家教委第



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请他就有关傣人的族群认同、民族意识及识别等问题发表了讲演。后来，我又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上，陆续读到龚老师讨论“民族意识调控”的系列文章，感受到不少新意。我与龚老师的学术交流不算太多，对同样的问题也许我们会用不同的概念去描述或分析，看法当然也不会完全一致，但我深切地感受到，龚老师和我一样，都对教条主义式的“民族理论”有所不满，也都试图在现有基础上有些新的思考与尝试。用龚老师的话说，十多年前我思考的“民族政治学”问题，与他近十年来努力探索的“傣人识别”问题及“民族意识调控”问题，多少是有相通之处的。可是，很惭愧，我很快就远离了那个当时自己曾一度感兴趣的题目，而龚老师对问题的执着、勤奋、热情及勇气，却都是我所不及的。

现在，我的案头上打开了龚老师的另一部书稿《民族意识调控说》，龚老师嘱我为她写几句话。“民族意识调控”，是作者从他自身长年参加傣人族际识别的学术实践，并在对我国民族学前辈所做的民族识别工作的经验与教训试图展开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形成的自己有关“民族理论”的一个新观点。我觉得，无论这个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站得住，是否能得到民族理论工作者们(包括部分有兴趣的民族学研究者)的赞同，作为对“民族识别的理论阐释”，它都可能引起我们对我国现行的民族理论进行一番必要的反思。显然，在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出现新的观点和看法，既不奇怪，也很有意义。至于“民族意识调控”观点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已有我国民族研究领域的老前辈马曜教授，在他的

序言里做了很好的评论。我觉得，自己并非这个问题的专家，因此也就不再去多余地饶舌了。

但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或一定程度上也算半个同行，我以为，龚老师提出的问题和观点，确实有很多地方，值得学术界认真去思考，并展开进一步的深入讨论。关于“民族意识”、“身份认同”、“族群性”，或以前还常使用的“民族心理素质”、“民族性格”等等，总之，涉及民族或族群的心理层面、精神层面与情感层面的问题，始终是“民族理论”、民族学、人类学及有关社会科学的难点之一。面对错综复杂的这一类问题，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学者们，相互间有很多分歧，甚至人们用来描述基本的现象或事实的概念及“话语”，也都很不相同。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先是前苏联民族理论的影响，接着是西方族群与认同理论的传播，当然还有一部分中国学者，根据中国的实际，尤其是基于中国民族识别的实践和中国民族关系的现实，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我认为，在这些不同的观点之间，应该展开积极的学术对话，求同存异，克服相互间话语和概念体系的障碍，首先努力去理解对方的与自己不同的看法。本书的作者也表现出了积极对话的学术精神，大家从他的具体论述中是可以体会到的。

无论观点多么分歧，概念如何不同，大家都承认有关“民族意识”、“身份认同”、“归属意识”及涉及族际关系的心理与情感问题，对于一个多民族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许多区域性社会也正是这样的多民族社会。如果撇开概念之争，忽略

观点和学术体系的分歧，我觉得，大家彼此倒是有一些基本的共识：1、民族或族群的意识、心理、情感(含情绪)、认同等，大都是相对于民族或族群的族体、物质性的社会生活及社会存在而言的。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常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但也认为民族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特性。2、大家都倾向于认为，民族或族群的意识、心理、情感及认同，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稳定的，可以因条件、背景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西方学者多认为，族群性乃是社会的建构物，认同里包含着主观的态度和人们的选择及行为，并非客观性的存在。3、民族或族群的“意识”及其他心理层面的问题，主要是在族际关系的具体背景下，在具体的族群互动过程中，显现、被意识和得以强化的；也只有在族群互动关系中才能被理解和被研究。就是说，通常是在民族关系的具体场景下，民族意识问题才有意义。

以龚老师等人从事的傣人识别工作为例，实际就是在族际背景下完成的，所以，他的书名叫做《族际识傣》；而“民族意识调控”的观点，不仅包含了族际关系背景方面的意思，还内涵了“政治”和“政策”方面的意思，即政府的因素，由政府出面对多民族社会或多族群的社区里的民族意识进行可能的“调控”，进而实现控制民族关系，使之相互间和睦相处的意思。

考虑到民族意识和认同的问题非常复杂，尤其在中国多民族的社会及文化的背景下，具体情形实在是千差万别，我自己曾经提出过一个“多重认同”的看法。我的意思是说，族群或在族际关系具体情景下的个人，常常是根据实际，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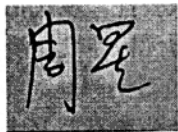
活地表现和表达其主观认同的态度的，这方面以海外华人的例子为典型。在国内，情形又何尝不是如此？就是说，对于祖国的政治认同、对于本民族或族群支系的文化认同等，它们往往是可能并存不悖的，未必是水火不容的，关键在于人们怎么去处理和看待它，例如，怎么处理好祖国意识和民族意识间的关系等等。现在想想，其中似乎也有点“调控”的意思。总之，既然民族意识也好，族群认同也好，都有社会文化建构和人为实践努力的成分，那么，坦然地讨论“调控”也就是可能的了。

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由多民族的“多元”构成为“一体”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国内不同区域间的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距，区域差距又与民族分布格局存在对应关系，这就需要更加注重处理好民族关系，以及调控好民族意识的问题了。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都不断导致着我国民族关系的新变化，引发着民族意识或族群的身份认同出现新的情况与趋势。显然，此时提出“民族意识调控”的观点，的确是很有实践方面的重要性。现代化进程导致的变化之一，可能是族际间的物质边际日益模糊淡去，而心理层面的边际却依然存在，甚或可能得到强化。正像一些日本学者曾经讨论过的“汉化”和“汉族化”的问题那样，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固然存在着物质或器物甚至制度层面的“汉化”，但却不是“汉族化”，因为族际间的心理边际和意识及认同的问题，却更加复杂化了，在我看来，也就是更加多重化了。

最后，我要说到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关系问题。不久

前在参加中央民族大学一位硕士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会上，我曾提出过这问题。其实这是我提给自己的问题。我认为，尤其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研究领域里，经常出现以民族行政工作的语言（即政治话语，有时甚至只是标签、标语或口号）替代学术研究的情形，这在过去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但现在却是应对此种情形予以抵制的时候了。如果要发展真正的“民族研究”方面的学术，如果想要更加切实地搞好民族团结，我们就应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反思，就不应是行政性的结论或命题先行而应该是研究实践先行，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摆脱教条主义。

以上是我看到龚老师著作后引起的一些感想，有点自言自语，也未必都与该书主题密切相关。我把它写在这里，权当是表达一种与龚老师及其他同行对话的意愿，不妥之处，请各位批评。

A square stamp containing the handwritten signature '周星' (Zhou Xing) in black ink on a textured, greyish background.

周星 1998年9月2日写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 目 录

## 序 言

马序.....	1-6
周序.....	7-12

## 第一章 引 论

——理论与实践反差的反省.....	1
第一节 惊世壮举竟然理亏一截？ 民族识别评析用错标准.....	5
第二节 突破“定义”岂止中国特殊？ “四大要素”不切民族实际.....	26
第三节 马克思强调“族际主义”： 以讹传讹有历史原因.....	41
第四节 民族理论仍困于“硬核”： 文化自觉可借重“识别”.....	56

## 第二章 个案实录

——侏人识别的工作过程.....	73
第一节 侏人识别的田野调查 前赴后继，不畏艰辛.....	76

第二节	傣人识别的专题研究： 格物求是，分科进取.....	87
第三节	傣人识别的社会协商： 层面沟通，情理交融.....	101
第四节	傣人识别的行政确认： 郑重庄严，步步落实.....	120
<b>第三章</b>	<b>经验反刍</b>	
	——民族意识调控的最初感悟.....	127
第一节	傣人识别：“傣傣意识”的互动过程.....	137
第二节	学术探讨：傣傣意识运化的特殊形式.....	154
第三节	工程实质：政府施行的傣傣意识调控.....	167
第四节	历史评价：平等团结政策的具体落实.....	182
<b>第四章</b>	<b>扩展比较</b>	
	——民族识别的分类观察.....	193
第一节	“着重追溯历史渊源”： 借助历史重建共识.....	201
第二节	“民族支系的认定和归并”： 借重语言调适认同.....	212
第三节	“民族名称的确定与更改”： 他我互动的典型反映.....	225
第四节	“其它”诸例及其它： 全都有民族意识的具体调控.....	237

## 第五章 重新评价

——科学与政治的统一视角.....	255
第一节 民族平等：千古巨变的客观要求.....	258
第二节 众志成城：顺理成章的良性整合.....	272
第三节 名实距离：客观存在的历史局限.....	288
第四节 政法操作：历史局限的系统突破.....	300

## 第六章 结 语

——实践和理论的恳切对话.....	311
第一节 民族类型五彩缤纷： 族际标志取决于认同.....	315
第二节 认同受制于社会互动： 民族过程受意识调控.....	330
第三节 民族意识是政治资源： 调控行为是政治律动.....	346
第四节 调控必须遵循规律： 民族意识研究任重道远.....	362

## 附 录

参考文献.....	387
后记.....	408



第一章

引  
言

理论与实践反差的反省